

## 第十五章

## 红色中国能变绿吗

中国不能再走西方走过的那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会觉得这很不公平，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变暖”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不过是西方炮制出来的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阴谋”。的确，在中国工业巨龙开始“吞云吐雾”之前，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肆无忌惮地把巨量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中，在此之后又把国内污染最重、耗能最高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就这方面来说，这个要求的确是不公平的。可是，大自然母亲是不管这些的。它知道的只是硬邦邦的科学和冷冰冰的数学：如果中国坚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那么其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换来的将是环境崩溃。

1990年开始我经常前往中国采访，现在回头想来，最令我难忘的是：每去一次，都感到中国人民的言论更加自由，然而空气污染却越来越严重。

的确，现在你可以在[中国开诚布公地与官员和记者交谈](#)，但是空气质量却不尽如人意。2006年11月我访问上海，当走出酒店房间准备外出采访时，发现空中浓烟滚滚，老实说，我当时闪过的念头就是酒店着火了，而事实上却是当地农民收割完作物之后在地里焚烧秸秆。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的官员和商界精英谈及[污染问题时](#)他们都会说：当中国发展起来富裕到足以治理污染时自然会去治理。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能源气候年代”，中国只有对污染进行治理才能够富裕起来。除非[红色中国变成绿色](#)，否则共产党的领导层将无法兑现提高全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承诺。

关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邓小平曾经用当地方言说出了那条至理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一“猫论”说的就是只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可以了。但客观情况不允许再这样了。现在，如果这“猫”不是绿色的，那么无论是“猫”自己、老鼠或是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不可能再享受发展。

污染问题近年来日益严峻，如果中国领导层再不采取行动，不但将深陷其中，而且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将更加不利。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明镜周刊》的一次采访中（2005年3月7日）坦率地谈到：

环境恶化有其内在原因：原材料短缺、耕地面积缩减、人口不断增长。目前中国有 13 亿人口，这一数字是 50 年前的 2 倍，到 202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15 亿。而在城市扩张的同时，沙漠也在不断蔓延，可居住区域以及耕地面积在过去的 50 年里缩小了将近 1/2……环境再也不能承受如此重负。中国有 1/3 的地区经历过酸雨、七大河流中有一半被严重污染，1/4 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用水、1/3 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还不到垃圾总量的 20%，最后，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有 5 个都在中国……

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8%~15%，而人们为此付出的健康代价更是无法估算。仅在北京一个城市，70%~80% 的致命癌症病因都与环境有关。肺癌已经成了杀手。

除了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近几年大幅增加的能源消耗也让中国的领导层感到震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中国环境专家小组的一位成员对我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1980~2000 年间翻了两番<sup>Double</sup><sub>Exponential</sub>，但其能源消耗量只增加 1 倍，这反映了中国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政府的严格管制。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得该国的外商投资大幅增加，尤其是制造业，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出口。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能源效率却降低了，并引起领导层的警觉。随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高耗能地建设其基础设施，同时承接了西方转移来的高污染产业，以及中国人民开始在配有空调、电视和计算机的大房子里享受舒适的生活，中国 2001~2005 年间的能耗率超过了其 GDP 的增长率——2005 年能耗增长速度甚至比 GDP 增长率高出 40%。

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像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

到气候变化不仅是事实，而且快过任何人的预期，并以潜藏灾难的方式在改变中国本土的气候。“2007 年中国全年的平均气温达到 10.3 摄氏度（50.5 华氏度），这使得 2007 年成为自 1951 年全国气候观测网络建立以来最暖的一年”，《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报道说（2008 年 1 月 4 日），“这一创纪录的高温标志着全国平均气温已经连续 11 年高于正常年份，也大幅高于 2006 年所创下的第二高的 9.9 摄氏度（50 华氏度）。”

2006 年 12 月，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官方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西北地区的冰川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减少了 21%，并且中国所有的主要河流在过去 50 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在缩小。“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制约了国家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部（撰写此报告的 12 个政府部门之一）这样写道。

科学技术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接受新华社（2007 年 10 月 4 日）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来气候变化已开始对中国产生破坏性影响，我们不应该等到事情无法挽回时再采取行动。”中国政府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① 中承诺调整经济结构、推广清洁能源技术以及提高能源效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其国内巨大能源需求的 80% 要靠煤电满足。而且，中国的煤电供给每两周就要增加大约 10 亿瓦。

吕学都对新华社记者说，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产量（包括小麦、稻米、玉米）到 21 世纪下半期最高可下降 37%。他说：“气候变暖还可能使江河径流量减少，旱涝灾害出现频率增加。2010~2030 年，我国西部地区每年缺水量将达到 200 亿立方米。”新华社报道指出，气候变化还会严重威胁生态脆弱的地区，如青藏高原，这一地区是中国各大流系的发源地。河流径流量减少不仅会减少农民收成，而且也将显著削弱水电站发电能力，而这又将促使中国比现在更加依赖煤电。

但对中国领导层来说，认识到问题以及认识到问题紧迫性只是战役的一

①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 年 6 月 4 日由国务院首次发布。——译者注

半。能否得到从城市到省到中央的政府，以及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的整个系统的响应又是另一回事。

2007年9月，我在一个晴朗温暖的秋季里访问了北京。每次我到一位中国官员办公室去采访他时，我总会松开领带并且大声嚷道：“嘿，是这里稍微暖了点，还是只是我觉得？”

有人告诉我的确是变暖了，不是个人的问题。2007年6月，中国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所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司以及公共建筑里的私人业主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摄氏度（79华氏度）。也只有中国才有可能采取这种方式。**中国夏季的电力1/3都用于空调。你在他们的公共办公室里能明显感觉到室内外温差。**

几天后，当我读中国英文版报纸时看到了一则来自《上海日报》的报道。报道称，市政府已派出调查小组检查政府发布的关于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执行情况，他们发现：“通过当地能源部门了解到，市里有1/2以上的公共建筑没有严格执行室内空调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的节能标准。”

这是一条来自中国的又好又坏又有趣的消息。好消息是，政府已决定加强对公共建筑里的空调设备的控制。这表明了政府开始严肃对待此事。坏消息是在北京以外的省份和城市里，甚至就在北京市里，地方官员并不理会国务院的环保法令。就像中国的一句老话：“天高皇帝远。”

但有趣的是，有人授意《上海日报》（中国的官方报纸）披露那些无视空调节能标准的城市建筑和政府机关。这在5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真正有趣的是也许并没有人授意《上海日报》发布这篇报道。相反，可能是富有开拓精神的新闻工作者自己外出采访撰写了这篇报道。）

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这是一盏悬挂在头上的警示灯。领导层意识到：如果不解决环境、能源与气候问题，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污染的空气就会破坏社会稳定。因此，寻找一条绿色增长之路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不仅仅只是一种选择。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领导层也像世界上其他许多政府一样正在“能源气候年代”里将其合法性为基础，从保卫既有的中国疆域，转移到提供更高质量生活、保护国家免遭环境恶

化、能源和气候崩溃之灾。

所以，我们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中看到中国政府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一方面，自上出台了涵盖面更广的环保法规。另一方面，让下面有能力推动更多的改变：陆续赋予公民和媒体更大权力去揭露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向继续从旧的、廉价的煤系统中渔利的地方官员和工厂施加压力。第三方面，中国领导层鼓励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挖掘高效清洁能源蕴涵的巨大经济机会，并告诉他们：“绿色光荣。”

P.C.

中国“十一五规划”包含着一个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据估计，这将减少约1.5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一目标是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雄心勃勃的承诺量的5倍。负责监督能源计划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在各省和工业部门中分配了减排目标。并且，这次领导层明确表示，这些目标的完成情况将与每一位政府官员的人事考核挂钩。把提高能源效率和实现环境治理目标具体落实到个人负责，领导层亮出了利器。不过，2006年和2007年中国都未能实现每年把能耗降低4%的目标。除非我看到一个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或者企业经理实现了GDP目标却因未能完成绿色目标任务而被解职，否则我对此依然持怀疑态度。但至少在文件上，中国的态度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强硬。  
 $(1 - 4\%)^{10} = 66.48\%$

不幸的是，中国的领导人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城市化的绝对规模和范围是惊人的：**到2020年，城镇人口预计将从42%增加到60%。**也就是将有数千万计的新增城镇居民和数百个新的卫星城市。**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高级副总裁江林（音）**在2008年5月的报告中指出：“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对用于修建新建筑、新道路、新发电厂以及新工厂的能源密集型材料的需求也会急剧增长。”他又补充道，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

为了给予相关政府部门更多力量，2008年3月中国提高了环境保护部

的地位❶，使其成为正式的内阁部门，拥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和更充足的财政预算。

“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已经采取了几项世界级的政策，而且他们正在采取更多的应对措施。在某些领域，他们甚至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管理协助计划（Regulatory Assistance Project）的董事及创始人之一默斯克卫茨（David Moskowitz）说。管理协助计划是一个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环境保护问题的美国非营利性研究团体。

2006年1月1日，中国正式施行国家可再生能源法。美国2007年的类似立法却没有得到通过。中国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各省级政府要为本地大力开发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占能源总量的比重从目前的7%增加到16%❷。中国还采用了世界先进的汽车油耗标准。

默斯克卫茨指出，中国于2007年10月还颁布了一项约束发电厂生产行为的新规定。规定要求发电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使用最清洁的能源——天然气、太阳能或者风能，而不是一开始就燃烧煤之类的最便宜的燃料。“这项规定增加了市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并且对排放量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默斯克卫茨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在美国）也采用这种措施，那么情况就会有很大好转。”中国在努力清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同时还制定了差别定价制度，国家电力公司目前对效率较低的行业收取较高的电费，对那些更有效率的行业则收取较低的电费。这样一方面鼓励了那些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又迫使效率较低行业要么提高效率要么停产。

“因此，最有效率的钢厂在两个方面都是赢家——能耗较低以及能源成本较低。同理，效率最低的厂家至少在两方面遭受损失——高能耗和高能源成本，这样其生产成本因此也更高。”默斯克卫茨说，“但我们也无法让我们自己的电力公司做到这一点，甚至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中国目前正在关闭其

效率最低的小型发电厂，按照此计划，到2010年将关闭共约5亿瓦产能（占中国发电总产能的8%）。最重要的是，中国自2006年起就着手起草国家能源法，这将为整个国家提供一个长远的战略，而且领导层不断征询专家的意见，以使该战略更具科学性、更贴近实际而不仅仅是由国家颁布。这一点就强于美国，美国的每一个能源法案都是各个游说团体的利益总和，没什么长远的战略价值。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能耗的年增长率约15%，而美国仅有1%或2%，因此中国的环境状况比美国差得多。“他们是低效率，”默斯克卫茨说，“但他们正迅速变得有效率，因为随着很多新发电站出现，他们的平均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

中国领导层越是大力推动绿色增长，这个目标的公信力就会越高。因此，有人在想中国领导层是否可以不再向民间社会授权而完全赋予作为绿色监督者的各种权力，这样可以促使新的环境保护规定在高层得以通过，并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中国公众是领导层对付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里的那些污染GDP主义者的盟友。我也在密切跟踪这一事态的发展。

绿色运动已经作为民主社会里的“草根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它们自下而上，通常是当一个社会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而且关心环境问题的中产阶层后应运而生。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很好的环境法律文本，但如果没民间社会团体去监督执行情况以及起诉试图绕过法律或违法的地方政府或公司，这些法律总是非常脆弱的。2007年9月，我从中国回来后参加了塞拉俱乐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年会，在那里我得到了更多有关这一话题的信息。年会准备授予我一个新闻奖，那是那天晚上塞拉俱乐部颁发的十几个奖中的一个。在颁奖仪式上，满满脑子都是中国。那天晚上几乎每一个奖项都颁给了地方公民或塞拉俱乐部的小型分会以及民意代表，他们靠自己的力量通过美国法庭或监管机构揭露、制止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环境破坏行为。

❶ 2008年3月，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译者注

的普通啊。他们只是普通公民。他们真切地关心环境问题以及捍卫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请愿的权利，他们同庞大的公司或地方政府较量并取得了胜利！

下面就是其中的部分代表。加州第一国会选区的代表国会议员汤普森（Mike Thompson）获得了塞拉俱乐部的埃德加·韦伯恩奖，他在 2006 年积极游说国会通过国家立法，使北加州 431 平方英里的旷野得到保护。特别成就奖颁给了塞拉俱乐部伊利诺伊州的负责人，他发起了全州运动以通过新的关于汞污染的条例。沃尔特·A·斯塔尔奖授予南卡罗来纳州沃尔哈拉的斯奈德（Ted Snyder），他用了长达 35 年的时间反对国会在大烟山国家公园（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里修建一条 37 英里公路的方案，因为此路将切断东部山区最大的无路地带。威廉·O·道格拉斯奖给了明尼阿波利斯的邓肯（Richard Duncan），他在塞拉俱乐部保护边界水域的诉讼案中妥善处理了关键条文。

在此书将要完成的时候，我收集了一些有关中国环境的报道，这些报道向我们展示了那里正在发生的变化：

19

为高效照明的节能灯，财政将对此进行补贴。这是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今年 1 月份发起的一项节能运动中的一个项目，希望在未来 5 年推广 1.5 亿只高效照明节能灯。几个省份需要完成 200 万—300 万只灯泡的更换任务，其中北京要完成 200 万只灯泡更换。中国现今至少生产了世界 80% 的高效照明灯泡，比 2006 年的 24 亿只和 1997 年可怜的 2 亿只有了长足进步。如果中国所有白炽灯都被节能灯取代，那么每年将可节省 600 亿千瓦时的电力，相当于每年减少 2200 万吨标准煤的燃烧，也就意味着会减排 600 万吨二氧化硫。〔新华社，2008 年 5 月 14 日〕。

在过去 15 年中，已有超过 8 万名记者参加了“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这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全国性的环保活动。自 1993 年以来，新闻工作者已发稿 20 余万篇，以提高公众的能源和环境认识。他们的报道不仅有助于整顿中国的高污染采矿业，而且还推动调查工作以保护黄河和长江。活动的主题每年都有不同的侧重点，2007 年侧重于减少能耗以及污染排放。“北京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7% 的受访者关心食品安全，66.9%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然而，尽管对污染问题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但仍有人认为他们在环境保护中没起到什么作用。”〔新华社，2008 年 1 月 8 日〕

有 1/2 上报其污染程度已达“五级”或更糟（毒素的最高含量），

也就是说当地河水已不适宜人类接触而且甚至也不适合用于灌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毛如柏在周日发布一份报告中说，虽然多年的整治以及废物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了工厂对淮河流域和辽河流域造成的污染，但工业污染依然严重。

《中国日报》报道，河流已对“全国 13 亿人口中的 1/6 人群的用水安全构成威胁”〔路透社，2007 年 8 月 27 日〕。

中国要求各省级政府在今年内将 5000 万只传统的白炽灯更换

现在，一个新的因素已经出现了：清洁技术产业在中国方兴未艾，推动绿色法律法规的出台和贯彻落实正是该产业的利益所在。在绿色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增加销量、养精蓄锐、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削减成本，然后利用杠杆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中国领导层正在积极推动清洁技术的推广，这样做可以让国内生产总值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相互兼容。当中国为其污染问题寻求技术解决方案时，它也在努力创造一个出口产业。

只需要与一个市长坐下来聊聊天，你就能了解中国在清洁技术的推广上下了多大工夫。长期担任大连市市长的夏德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不错的交谈者。那座拥有 600 万人口的沿海城市里有很多公园，夏市长在尽心尽力维护现有公园的同时还在不断修建新的公园。他的这些努力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大连也是我最喜爱的城市。作为国家软件中心，夏市长清楚它必须吸引知识型人才，而这些人群流动性极高而且很喜欢适合居住的城市。

2007 年 9 月我采访了夏市长，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以及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和全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大连就面临淡水紧张的困境，所以我们要发展节水产业。第二，大连缺煤，这意味着我们还得大力发展节能产业……如果我们要在环境、能源以及增长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就必须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像软件……目前中国正在推广循环经济理念即重复利用一切。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就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去做。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向前迈进且从现在开始。在环保和能耗上我们颁布了严格的规定。举例来说，我们这里没有钢铁厂，因为它污染空气而且消耗大量能源。我们已经把 100 多个工厂迁往工业园区，在那里集中治理污染。去年，我们关闭了 31 家污染超标的大型水泥厂，并且我们今年计划关闭 19 个小水泥厂……我们最先关注的是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比，其次就是减少污染和浪费。”

然后他又说，大连规模宏大的新会展中心采用了尖端清洁热泵技术。这种技术能从海水中收集热能，然后用这些热能来为整个建筑供暖或提供冷气，这是一种完全可再生的方式。“我们可以节省 30% 的能源成本。”他自豪地说。

当我询问市长先生这些日子他是如何安排时间的，他回答说：“在经济工作方面，我  $1/4 \sim 1/3$  的时间都用来减少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我想把大连建设成节能城市……我们在设定环境标准时是向发达国家看齐的。我们把

我们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定在欧洲水平线上，我们的空气质量能与欧洲国家相媲美。”

他补充道，大连刚刚通过竞标赢得了筹建中国顶级能源研究实验室的机会。自 2000 年以来我曾数次采访夏市长，但从未与他像这样畅谈过。

我也从未做过像采访施正荣那样的访谈——他的财富在福布斯杂志上名列中国第七。我 2006 年采访他时他身家已有 22 亿美元。猜猜他是做什么的。房地产？不对。开银行？不对。开商场？不对。搞建筑？不对。他是中国最大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电池能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

没错，现在中国有一个大富豪是绿色企业家！而这应该只发生在美利坚。施正荣认为，清洁电力将会成为 21 世纪很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并且他要让中国和他的公司——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成为业界领袖。施正荣年仅 45 岁，雄心勃勃。他告诉我，他会像中国以前做帆布鞋那样做大太阳能产业：降低成本，让数百万人能买得起太阳能光伏板。

1992 年施正荣在澳大利亚获得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在临近上海的无锡市成立了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是：尚德结合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世界二流的价格”——该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四大顶尖太阳能制造商之一，其他三家分别是日本夏普、日本京瓷和英格兰 BP。施正荣告诉我，他的成功在于雇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并非高科技仪器——制造太阳能模版和处理晶体硅，而且几个省级政府还向他提供了补贴，希望他把尚德公司建在他们的地盘上。他说，目前尚德公司大约 90% 的业务都在国外。但随着他一步步降低太阳能电池价格，中国市场也在被拓宽。施正荣希望价格和市场规模的组合优势能让他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并降低太阳能电池价格，真正以成本优势击败全球竞争者。

“如果我们在在中国有市场，我们就有信心成为价格主导者。”他如是说。由于尚德公司的成功，“虽然我们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市场，但现在却有很多（中国）商家在向这个行业转移”，他说，“现在很多政府人士都认为‘这是一个产业’！”

太阳能并不是唯一的可再生能源。中国的风能产业也正在经历高速增长

大幅改善城市污染状况。事实上，我在北京待的那两天都是蓝天白云，碧空万里。”

当谈到清洁能源技术时，能源顾问沃森曾说：“中国刚刚开始从复制转向发明，他们上次全力投入发明创造时给我们带来了纸、指南针和火药。”



**P.C.** 长：中国风力发电产能从2005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近100%。中国在2007年底就实现了5000兆瓦/年风力发电的目标，该目标原计划是到2010年实现。按照这个速度，中国不出5年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风力发电生产国和制

造国。

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威灵霍夫（Jon Wellinghoff）2008年4月从中国回来后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我这趟中国之行里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们（中国）已经把所有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都换成了电动自行车。目前中国有4000万辆电动自行车。我都懵了！而且他们晚上都会把车上的小电池提到楼上充电，早上又拿下来重新安回到他们的电动自行车上，然后骑车出行。中国的交通很可能实现电动化，而且他们正在这样做。就算这种电动化仍然是以煤电为基础，这也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

综合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切，中国变绿的故事正在一步一步发展，我们拭目以待。这个故事由许多正面的东西和负面的东西交织而成，但却满是希望，满是环境的启示，我不想预测故事的结局。我会密切关注所有指标，我认为决定红色中国能否变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人如何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挑战。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中国未来20年预计将会兴建数百座新城市和小城镇，将把3亿多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新建的住宅和办公楼里，同时还要为不愿进城而想留在乡村的2.5亿人兴建家园。这种建设规模是世界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如果中国领导层采用高能耗模式——“美国方式”——大兴土木，那么一个巨大的恐龙便会横空出世，在未来几十年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全都耗尽。它将最终把中国吃穷。请牢记，在国家耗费的能源中建筑业占40%，而且一旦它们开始消耗能源和水，那么没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它们是不会停下来的。如果中国决定抛弃美国过时的做法，跃过我们的这一阶段，直接过渡到“零耗能”建筑，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绕过最严重的危机。

所谓的“零耗能”是指采用无源照明、太阳能外墙或者风力涡轮机白天生产供自己使用的电能，晚上才靠电网供电的模式。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像他们的前辈对待计划生育政策那样严肃认真地实行“零耗能”政策，正如计划生育政策挽救中国于人口灾难那样，“零耗能”建筑可能挽救中国以及整个世界于能源和环境灾难。

总之，中国正在有目的地除旧革新，那么我们就应该竭力保证“新中国”有一张绿色面孔。但这并不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所以美国要在这个时候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可以提示中国路在何方，但我们要先探路。领导者不

能说“跟你走”，而是要说“跟我来”。我们自己也是大量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地球慢慢升温的一分子。我们有义务用自己的资源为世界树立一个创造清洁能源体系的榜样。当今美国可以为自己、为中国以及为世界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树立起这样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最“绿”、能源效率最高和最具活力的国家。这样，它也因此会日益繁荣和安全，因不断创新而备受敬重。

更进一步说，当今美国可以为自己、为中国以及为世界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向所有的人表明“要比中国更绿一筹”。让中国人知道，我们要在未来伟大的全球工业——清洁电力中战胜他们。就像当年我们和前苏联进行太空竞赛一样，比试谁能最先实现登月计划。这种竞争大大推动了我们自己社会的进步，从教育到基础设施无不如此。现在，我们、欧盟以及中国需要进行一场类似的竞赛——维持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竞赛。冷战时期有赢家和输家，但在这场地球竞赛中要么大家共赢，要么大家全输。因为中国这辆高速巴士一旦爆炸，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环境上，对地球人而言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如果美国能果断地选择建立清洁能源体系并且提高技术不断推进这一系统向前发展，那么中国将别无选择，也只能果断地朝同一方向迈进。否则，这不仅意味着13亿中国人将继续呼吸浑浊的空气，而且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伟大的全球工业中落伍。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先施于人。只有我们（美国）自己开始做了这些艰辛的工作，我们才有资格建议中国该如何绿化他们的社会（我们已经饱食完大自然的“山珍海味”只留下“残羹冷炙”给中国人，而我们却指责他们贪吃，这在他们看来一定非常厚颜无耻）。默斯克卫茨说：“当我们每提出一项倡议时，中国人常常会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棘手问题：‘如果真是那么好，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做呢？’这很难回答而且有点尴尬。我们只能引用美国的一些州、城市或公司的例子，但却不能提及美国联邦政府。我们不能拿美国整个国家来说事。”

如果美国能领导清洁能源变革，而且中国认为有必要跟进，那就能促

使中国领导层赋予公民和媒体更多权力，让他们声讨破坏环境的行为，监督地方政府和企业。因此，我们美国把中国带入绿色通道的速度越快，我们就能越早拥有一个干净的世界，而且这还能加强中国的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力量。